

企业家精神与区域内收入差距： 效应与影响机制分析

程 锐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内容提要: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论证促进企业家精神与缩小收入差距之间的互补性关系, 即二者是统一的。研究表明: 第一, 企业家精神显著抑制收入差距, 即表明企业家精神越活跃, 企业家数量越多, 收入差距越小。通过替换收入差距指标、企业家精神指标和利用滞后 30 年的国企职工比重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 该结果依然稳健; 第二, 相比于 1995—2002 年时期, 2003—2015 年期间, 企业家精神显著抑制收入差距; 第三, 相比于收入差距的高分位点, 企业家精神对收入差距低分位点的抑制效果更显著; 第四, 企业家精神可以通过就业效应、收入效应和减贫效应而抑制收入差距; 第五, 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具有扩大总体收入差距和农村收入差距的作用, 但能抑制城镇收入差距。因此, 尊重企业家、降低企业家准入门槛、营造良好的企业家市场竞争环境, 以促进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精神, 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时, 也需加速城市化进程, 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关键词: 企业家精神 收入差距 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

中图分类号: F124.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5766(2019)06—0091—18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之初的 0.288 持续上升, 到 2016 年基尼系数达到 0.465, 超过了联合国划定的 0.4 的警戒线(刘伟等, 2018)^[1], 中国收入差距已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将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 人民更多的追求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更加公平的生活环境。遏制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 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议题。

改革开放前后, 收入差距的巨大变化形成了如下观点: 所有制结构转变与收入差距扩大同步发生, 企业家精神是收入差距持续恶化的根源(张顺和薛建强, 2014)^[2]。李楠(2007)^[3]指出, 中国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最根本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的演变, 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使居民收入差距全面拉开并逐渐扩大。唐未兵和傅元海(2013)^[4]指出, 非公有化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导致公有制下无法有效的激发企业家精神; 随着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有效的激励机制, 致使非公有制以外的新生企业构成了企业家精神的主要领地(钱颖一, 2016)^[5]。在此背景下, 往往将私营经济与企业家精神混为一体。事实上, 企业家精神是内置于每一个个体决策者内部的企业家才能, 具有强

收稿日期: 2018-08-29

作者简介: 程锐,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领域是企业家精神、国际贸易与区域经济发展, 电子邮箱: chengr1990@126.com。

烈的冒险精神,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进行创新和创业活动。企业家才能的高低决定了企业家精神,更高的企业家才能形成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由于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问题,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个体只能建立私营企业^①。如果将企业家精神视为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源,那么将会严重影响重大经济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纵观已有文献,企业家精神与收入差距之间的理论框架尚未形成,大量文献基于现实情况进行检验。由于企业家精神的特殊性,导致文献中对企业家精神与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进展相对滞后。Lippmann 等(2005)^[6]首次正视了企业家精神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通过界定社会层面的不平等(Societal Level Inequalities)和企业家精神,指出具有更高企业家精神增长率的国家具有更高的收入不平等,但是,在微观个体层面,企业家精神却可以实现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流动性的增强。紧随其后的一些文献考察了发达国家内部企业家精神对收入扩大的作用。例如,Atems 和 Shand(2018)^[7]利用美国 1989—2013 年的州际面板数据考察企业家精神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显著地提高了收入差距。Halvarsson 等(2018)^[8]利用瑞典的微观数据考察企业家精神与收入差距关系,指出劳动力中提高个体户的比重以扩大收入差距是通过扩大底层收入分布的方式,提高合伙制企业的比重以扩大收入差距是通过扩大顶层收入分布的方式。与此同时,Ragoubi 和 Harbi(2018)^[9]利用跨国数据研究指出,企业家精神与收入差距之间的正向关系在发达经济体中显著存在,在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经济体中不一定存在。Bonito 等(2017)^[10]研究指出,企业家精神对菲律宾的收入不平等几乎没有影响。而 Kimhi(2010)^[11]考察埃塞俄比亚南部企业家精神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指出企业家精神具有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作用。同时,Berkowitz 等(2006)^[12]研究了波兰和俄罗斯后社会主义时代的企业家精神与收入分布的关系,指出新型或小型企业劳动力比例偏离标准差一个百分点,波兰和俄罗斯分别占最低的 40% 人口收入份额增长的 1.4% 和 1.25%。由此可知,在跨国层企业家精神是否显著扩大收入差距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尤其是在转型经济体中,当经济体制发生巨大变化时,企业家精神与收入差距均发生巨大变化,二者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因此,深入剖析转型经济体企业家精神与收入差距关系,将会为正确理解二者关系以及科学决策提供更具现实性的指导。

关于中国企业家精神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结论显然具有更大的争议。改革开放前后,收入差距的巨大变化被认为是企业家精神所致(李楠,2007^[3];唐未兵和傅元海,2013^[4];张顺和薛建强,2014^[2])。而 DaCosta 和 Yan(2017)^[13]利用 2011 年 CHS 微观数据进行检验,指出企业家精神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可能存在着负面联系。二者结论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在于,前者单纯的从现象出发,进行简单的直觉判断;后者利用微观数据进行经验检验,微观数据虽然优点众多,但是微观数据容易忽视企业家精神的间接溢出效应,形成估计偏误。王先柱等(2015)^[14]利用 1992—2012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企业家精神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认为企业家创业精神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着显著地倒 U 型关系,企业家创新精神显著地降低收入不平等。而李政和杨思莹(2017)^[15]利用中国 2007—2014 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创业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创业具有普惠效应,可以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而创新型创业具有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基于宏观数据考察企业家精神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同样出现显著差异,前者认为企业家创业精神会扩大收入差距,企业家创新精神则会缩小收入差距;而后者却认为企业家创业精神具有普惠效应,而创新精神具有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两者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数据差异,前者采用 1992—2012 年数据并利用泰

① 事实上,如果国有企业具备良好的激励机制,那么国有企业内部也将会形成大量的企业家精神。正如钱颖一(2016)指出,政府部门的官僚主义严重扼杀了企业家精神,如果国有企业内部能够简政放权、减少官僚主义,那么国有企业内部将会极大地激发企业家精神。

尔指数衡量收入不平等,后者采用2007—2014年数据并利用城乡收入比衡量收入差距。

综上所述,企业家精神与收入差距之间关系并未形成一致结论,尤其是在转型经济体中,经济体制发生巨大变化,企业家精神充分发挥和收入差距扩大也同步出现,形成了十分矛盾的经济现象。尤其是在中国情境下,深入研究企业家精神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考察,其可能贡献所在:第一,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论证企业家精神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为企业家精神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提供直接论证,为协调二者关系找到了平衡支撑点;第二,利用199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表明企业家精神可以显著缩小收入差距,并且其抑制效应在不同时期内存在显著差异,并考察企业家精神抑制收入差距的机制及其边际效应的动态变化;第三,试图区别出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单独研究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差异性。本文研究指出,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具有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一方面为新时代鼓励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与缩小收入差距的分离关系提供一个警示;另一方面也说明为什么文献指出发达国家企业家精神具有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而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经济体却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其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形成的企业家精神属于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从而具有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企业家精神是内置于每一个个体决策者内部的企业家才能,具有强烈的冒险精神,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进行创新和创业活动。发挥企业家精神,释放企业家才能,能够有效的调动每一个决策者的积极性,改变收入分配格局。在转型经济体下,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资源配置逐渐转变为市场配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素配置的基本原则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根据Spubler(2010)^[16]消费者决策模型可知,消费者在成为企业家与工人之间进行决策,当消费者的企业家才能超过一定的临界值时,消费者成为企业家所获得的收入大于成为工人的收益,反之则成为工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家才能受到严重的制约,企业家精神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在转型过程中,企业家才能逐渐得到有效的配置,企业家精神得到发挥,大量具有较高企业家才能的消费者通过冒险精神在市场竞争中进行创新和创业活动,成为企业家,从而显著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释放企业家才能,可以充分提高收入与企业家才能的匹配程度。由于企业家才能是一种个人禀赋,受后天的影响程度较低,因此,只要制度能够最大化激发企业家才能,让达到临界值的企业家才能能在市场竞争中进行创新和创业活动,那么收入分配就能最大化的体现才能与收入的匹配。当收入分配与企业家才能充分匹配时,企业家精神就能够发挥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在转型过程中,渐进式改革推进市场化进程,企业家才能逐步被释放,企业家精神逐步被激发,大量体制外的贫困消费者,释放自身企业家才能,发挥企业家精神,在体制外进行创新和创业活动,创建大量企业,形成数量庞大的企业家群体,改变了收入分配格局。在转型期,企业家精神主要通过如下机制影响收入差距:

首先,企业家精神通过就业效应而降低收入差距。就业者和非就业者之间存在收入差距。两部门模型指出,现代部门扩张提高现代部门就业者的收入,而传统农业部门大量剩余劳动滞留农村,无法获得就业机会,收入无法提高,形成就业者与非就业者的收入差距,并持续扩大(Lewis, 1954)^[17]。企业家精神具有实现扩大就业的作用。企业家精神实现了自我就业,即自我雇佣(Halvarsson等, 2018)^[8]。企业家精神也可以带动其他人就业(Gilbert等, 2004)^[18]。Fritsch和Mueller(2008)^[19]研究指出,创业活动,不仅直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且也能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企业家精神虽然对已有的就业岗位形成破坏性,但其创造的新岗位却远远大于被替

代的就业岗位。

其次,企业家精神通过收入效应而降低收入差距。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一方面有助于提高自身收入水平,降低低收入群体比例,进而降低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企业家精神通过创办企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更高工资水平的就业岗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同时,企业家精神还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供更多样化、更高质量的产品(Spubler,2010)^[16],改善全社会的福利水平,降低收入差距。

再次,企业家精神通过提高收入流动性而降低收入差距。企业家精神的存在为打破阶层固化提供可能。企业家精神被认为是攀爬社会经济阶梯的潜在途径(Quandrini,1999^[20];Bruton等,2013^[21]),社会流动性的提高又会降低不平等程度,缩小收入差距(Ragoubi和Harbi,2017^[9];Sarkar,2018^[22])。Sarkar(2018)^[22]研究指出,企业家在“金字塔底部”能够克服严重的资源限制,充分发挥自身企业家才能,将商业策略和社会原则相结合创造价值,实现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例如,在中国转型时期,大量体制外的低收入者通过充分发挥自身企业家才能进行创新和创业活动,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实现个人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例如阿里巴巴的马云、新东方的俞敏洪等。

最后,企业家精神通过降低贫困率而降低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对立面是贫困率。贫困率的降低,贫困人口比例的减少,意味着基尼系数的下降,代表着收入差距的缩小。企业家精神可以作为减贫机制的重要途径(Bruton等,2013^[21];Kareem,2015^[24])。企业家精神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减少农村贫困人口,降低贫困率(韦吉飞,2013^[25];Kimhi,2010^[11])。同时,成功企业家会在社会舆论的监督下,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主动投身于帮扶脱贫事业。此外,政府政策也会促使成功企业家加入到脱贫攻坚的事业中,加快贫困人口的脱贫步伐。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家精神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H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家精神通过就业效应、流动性效应、经济增长效应和减贫效应四种机制来缩小收入差距。

与此同时,前文指出,企业家精神是基于企业家才能,而企业家才能又存在高低之分,因此当企业家才能更高时,企业家精神质量就更高。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具备更高的企业家才能,其在市场竞争中更具有竞争力,创新和创业活动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更严重,市场垄断力更持久。对潜在进入者形成巨大的进入成本,降低全社会高质量型创新和创业活动。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形成的高准入壁垒,一方面阻碍了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可能性,提高企业家临界值,减少临界值以下的企业家才能者进入企业家行业,降低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降低了潜在进入者提高收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提高了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退出门槛,降低了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的退出概率。因此,高质量型企业家通过阻碍潜在进入者,抑制了低收入者提高收入水平,降低收入流动性,提高了收入固化可能性。因此,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具有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

三、实证模型与数据说明

1. 实证模型

基于上述分析和研究之目的,本文利用中国27个省级^①层面1995—2015年的数据,研究企业

^① 根据田卫民(2012)测算的基尼系数可知,其中海南省、吉林省、山东省、西藏自治区数据缺失。同时,湖南省的城镇基尼系数和农村基尼系数时间段为1995—2005年,天津市的农村基尼系数时间段为1995—2001年,云南省的农村基尼系数时间段为1995—2005年。

家精神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具体估计方程如下:

$$gini_{i,t} = \beta_0 + \beta_1 entre_{i,t} + \sum_{\kappa} \beta_{\kappa} control_{i,t} + \xi_{i,t} \quad (1)$$

其中, $gini_{i,t}$ 表示 i 地区 t 时期的收入差距, $entre_{i,t}$ 表示 i 地区 t 时期的企业家精神指标, $control_{i,t}$ 表示相关的控制变量, $\xi_{i,t}$ 表示随机扰动项。为了消除内生性问题,采用动态面板并利用两阶段 SYS-GMM 方法进行估计,方程(1)进一步表述为:

$$gini_{i,t} = \beta_0 + \beta_1 gini_{i,t-1} + \beta_2 entre_{i,t} + \sum_{\kappa} \beta_{\kappa} control_{i,t} + \xi_{i,t} \quad (2)$$

为消除遗漏变量偏误,根据已有文献,加入如下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对外开放度、金融发展效率、财政支出和是否是东部地区的虚拟变量。

2.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收入差距($gini$)采用基尼系数衡量的做法在文献中已被广泛使用。借鉴田卫民(2012)^[26]的测算方法,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

$$G_j = 1 - \frac{1}{LY} \sum_{i=1}^n (Y_{i-1} + Y_i) \times L_i, j \in (u, r) \quad (3)$$

其中, L 是总人口, Y 为总收入, Y_i 为累计到第 i 组的收入, G_j 表示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u 表示城市, r 表示农村。利用上式计算组内基尼系数,采用“分组加权法”计算总体基尼系数:

$$G = L_u^2 \frac{I_u}{I} G_u + L_r^2 \frac{I_r}{I} G_r + L_u L_r \frac{I_u - I_r}{I} \quad (4)$$

其中, G_u 和 G_r 分别是城镇基尼系数与农村基尼系数, L_u 和 L_r 分别表示城镇、农村人口比重, I_u 和 I_r 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人均收入, I 表示全省人均收入。根据公式(3)和公式(4),可计算得到总体基尼系数、城镇基尼系数和农村基尼系数。

由于数据的限制,利用田卫民(2012)^[26]的方法只能将数据更新至2012年,为了获得2013—2015年的数据,采用拟合方法进行补充。由于城乡收入比^①与利用公式(3)计算的总体基尼系数之间存在着显著地线性关系,因此,利用城乡收入比作为解释变量、总体基尼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加入基尼系数的滞后一阶,即:

$$gini_{it} = \alpha_0 + \alpha_1 income_gap_{it} + \alpha_2 gini_{it-1} + \delta_i + \xi_{it} \quad (5)$$

其中, δ_i 表示个体效应。利用该公式估算 α_0 、 α_1 、 α_2 和 δ_i 的估计值,然后利用下式计算得到2013—2015年的总体基尼系数:

$$\widehat{gini}_{i,t} = \hat{\alpha}_0 + \hat{\alpha}_1 income_gap_{it} + \hat{\alpha}_2 gini_{it-1} + \hat{\delta}_i \quad (6)$$

由于公式(3)在计算总体基尼系数时采用了城镇人口比重和农村人口比重,体现了城镇人口比重和农村人口比重动态化。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镇人口比重不断提高、农村人口比重不断下降,反映了劳动力的空间再配置,因此总体基尼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流动因素,而城市基尼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集聚的规模效应。

(2)核心解释变量: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内涵极为丰富,包括创业意识、创新意识、冒险意识、竞争意识、合作意识、机会敏锐性等(李小平和李小克,2017)^[27]。由于其内涵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导致研究和考量企业家精神成为学术界一大难题。至今尚无准确的一致性衡量标准。为了尽可能地反映企业家精神,本文借鉴文献中通常的划分方法,即 Hébert 和 Link(1989)^[28]提出的划分标准,将企业家精神界定为企业家创业精神(*business entrepreneurship*)和企业家创新精神

① 城乡收入差距($income_gap$) =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第一,企业家创业精神。本文遵循李宏彬等(2009)^[29]、程俊杰(2016)^[30]的方法,采用私营企业比率进行衡量,即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借鉴李小平和李小克(2017)^[27]的兼顾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数量效应和就业效应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二,企业家创新精神。关于企业家创新精神指标的衡量相对统一,借鉴李宏彬等(2009)^[29]、李小平和李小克(2017)^[27]的方法,采用15~64岁人口中每万人专利申请授权数,即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申请授权数之和除以15~64岁人口总数。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15~64岁人口中每万人专利申请受理数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三,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具备更高的企业家才能,具有更强的“破坏性”。李政和杨思莹(2017)^[15]采用发明专利申请与劳动人口数量之比衡量创新创业,但该指标只能反映出企业家创新精神(李小平和李小克,2017)^[27],无法反映出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龙小宁和王俊(2015)^[31]研究指出,专利申请授权/受理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企业家的创新质量。原因在于:专利的受理与授权存在先后顺序和筛选过程,只有当专利获得了授权,才能获得认可和进一步开发利用,并拥有专利权,获得专利保护。当该比值越高时,受理的专利被授权的比例就越高,开发的专利质量就越高,从事创新活动的企业家所进行的创新活动就越有质量。因此,采用专利授权数与专利申请受理数之比作为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的衡量指标。由于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强调企业家质量,要求更高的企业家才能,会降低企业家比重,提高收入差距,因此,在具体实证分析中,将单独考察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3)控制变量:经济发展(*pergdp_ratio*),采用实际人均GDP增长率进行衡量。基本技能获取率(*basic_skills_ratio*),采用小学学历及以上人口比重进行衡量,反映基本技能获得水平。对外开放度(*Open*),采用进出口总额除以GDP进行衡量。金融发展效率(*fs*),采用地区贷款余额除以地区存款余额进行衡量。政府支出(*gov_ratio*),采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进行衡量。以上所用到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各省历年的统计年鉴。表1给出了相关统计性描述。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总体基尼系数(<i>gini</i>)	567	0.363	0.063	0.173	0.491
	城镇基尼系数(<i>gini_urb</i>)	479	0.268	0.042	0.135	0.377
	农村基尼系数(<i>gini_rural</i>)	461	0.301	0.046	0.177	0.415
核心解释变量	企业家创业精神(<i>entre</i>)	630	0.181	0.117	0.034	0.796
	企业家创新精神(<i>lnper_granted</i>)	630	0.361	1.370	-2.198	4.023
	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i>entre_quality</i>)	630	0.564	0.124	0.261	1.463
控制变量	经济增长(<i>pergdp_ratio</i>)	630	0.097	0.028	-0.071	0.210
	基本技能获取率(<i>basic_skills_ratio</i>)	630	0.898	0.067	0.559	0.983
	对外开放度(<i>open</i>)	630	0.298	0.350	0.016	1.684
	金融发展效率(<i>fs</i>)	630	0.825	0.185	0.380	1.627
	政府支出(<i>gov_ratio</i>)	630	0.165	0.085	0.047	0.627

资料来源:使用Stata13估计整理得到

四、实证检验

企业家精神与收入差距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而引起内生性问题,导致普通最小二乘(OLS)估计方法失效。收入差距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可能存在如下两种情形:第一,适度的收入差距代表着一个社会具有良好的阶层流动性、自由的劳动力流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稳定的预期下会极大地降低企业家的系统性风险,促使具有创业和创新精神的决策者从事创业和创新活动,激发全社会的企业家精神(Lippmann 等,2005^[6]; Raboubi 和 Harbi,2017^[9]);第二,收入差距过大代表着一个社会的阶层流动性差、劳动力流动性差、市场经济体制缺陷大,企业家的系统性风险预期大,降低企业家的预期收益,阻碍具有创业和创新精神的决策个体从事创业和创新活动,抑制全社会的企业家精神。因此,为了克服收入差距与企业家精神的内在因果关系,需要寻找合理的工具变量。然而,寻找合理的企业家精神的外生工具变量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实践困难,本文选择采用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并利用 Blundell 和 Bond(1998)^[32]提出的系统广义矩方法进行估计(Atems 和 Shand,2018)^[7]。同时也将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视为内生变量,以避免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内生性关系。因此,本文选择两阶段 SYS-GMM 进行估计,以收入差距、企业家精神和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的滞后一阶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根据两阶段 SYS-GMM 估计结果可知,AR(2)显著性均大于 10%,说明模型估计不存在高阶序列相关性, Sargan 显著性均大于 10%,说明模型估计不存在过渡识别问题。

1. 基准检验

表 2 给出了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精神对总体基尼系数、城镇基尼系数和农村基尼系数影响的估计结果。首先,从企业家创业精神指标估计结果来看,企业家创业精神指标的三个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企业家创业精神可以显著缩小收入差距,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从业人员越多,企业家创业精神越活跃,基尼系数就越低,收入差距就越小。其次,从企业家创新精神指标估计结果来看,企业家创新精神指标的三个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企业家创新精神可以显著缩小收入差距,越多的人员从事创新活动,越有利于甄别出企业家创新精神,越有利于提高从事创新活动的创新能力,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缩小收入差距。综合表 2 的估计结果可知,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精神显著缩小总体收入差距、城镇收入差距和农村收入差距,从而否定了传统看法,即认为企业家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同时,企业家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变量与东部虚拟变量的交叉项不显著,表明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并无显著证据证明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对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更显著。综合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家精神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表 2 企业家精神与收入差距:基准检验

变量	gini		gini_urb		gini_rural	
	(1)	(2)	(3)	(4)	(5)	(6)
<i>entre</i>	-0.0788 *** (0.030)		-0.1754 ** (0.083)		-0.2738 *** (0.092)	
<i>lnper_granted</i>		-0.0047 ** (0.002)		-0.0106 *** (0.002)		-0.0075 ** (0.003)
<i>pergdp_ratio</i>	-0.1740 *** (0.025)	-0.1805 *** (0.064)	-0.0433 (0.058)	-0.0417 (0.049)	-0.1456 *** (0.049)	-0.2261 *** (0.052)
<i>basic_skills_ratio</i>	-0.2207 *** (0.020)	-0.2527 *** (0.034)	-0.0946 ** (0.047)	-0.1079 ** (0.043)	-0.0514 ** (0.023)	-0.1235 *** (0.040)

续表 2

变量	<i>gini</i>		<i>gini_urb</i>		<i>gini_rural</i>	
	(1)	(2)	(3)	(4)	(5)	(6)
<i>open</i>	0.0036 (0.009)	0.0050 (0.007)	0.0208*** (0.008)	0.0274** (0.012)	0.0143 (0.009)	0.0091 (0.007)
<i>fs</i>	-0.0580*** (0.011)	-0.0835*** (0.013)	-0.0694*** (0.016)	-0.0699*** (0.012)	-0.0353*** (0.008)	-0.0694*** (0.013)
<i>gov_ratio</i>	-0.0166*** (0.006)	-0.0311 (0.029)	-0.0934*** (0.010)	-0.0822*** (0.026)	-0.0473** (0.022)	-0.0555*** (0.020)
<i>L. gini</i>	1.0075*** (0.044)	1.0087*** (0.049)	0.8986*** (0.052)	0.9147*** (0.053)	0.8312*** (0.037)	0.8271*** (0.086)
<i>D</i> (是否为东部)	0.0363 (0.045)	0.0020 (0.002)	0.0716 (0.123)	0.0002 (0.003)	0.2454 (0.154)	0.0015 (0.004)
常数项	0.2712*** (0.022)	0.3134*** (0.039)	0.2061*** (0.036)	0.1882*** (0.040)	0.1657*** (0.026)	0.2452*** (0.046)
观测值	540	540	452	452	434	434
<i>AR</i> (2)	2.11 [0.03]	1.96 [0.05]	-0.32 [0.74]	-0.19 [0.84]	0.22 [0.89]	0.58 [0.56]
<i>Sargan</i>	25.29 [1.00]	24.93 [1.00]	25.83 [1.00]	25.06 [1.00]	23.41 [1.00]	22.31 [1.00]

注:圆括号是标准误,方括号是 *P* 值;***、**、*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使用 Stata13 估计整理得到

2.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其结果的可靠性,采用替换基尼系数、企业家精神指标和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增强基准检验结果的可信度。

(1) 替换被解释变量。中国收入差距中城乡收入差距占据重要地位,并且成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33]。已有文献利用城乡收入差距衡量收入差距,其中雷欣等(2014)^[34]利用城乡收入差距作为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指标以反映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因此,首先采用城乡收入比作为基尼系数的替代指标,估计结果如表 3 中第(1)列和第(2)列所示。估计结果显示,企业家创业精神与创新精神指标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同时,由于城乡收入比并没有考虑到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李政和杨思莹,2017)^[15],因此,城乡收入比忽略城乡人口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收入结构变化。利用考虑人口结构的泰尔指数替换基尼系数。估计结果如表 3 第(3)列和第(4)列所示。估计结果显示,企业家创业精神与创新精神指标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综合表 3 估计结果可知,在考虑城乡劳动者技能差异和城乡人口结构差异的情况下,利用城乡收入比和泰尔指数替换基尼系数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均表明企业家精神具有显著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表 3 稳健性检验之一:替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城乡收入比		泰尔指数	
	(1)	(2)	(3)	(4)
<i>entre</i>	-0.6497*** (0.152)		-0.2159** (0.090)	
<i>lnper_granted</i>		-0.0964*** (0.008)		-0.0254*** (0.005)

续表 3

变量	城乡收入比		泰尔指数	
	(1)	(2)	(3)	(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9509*** (0.068)	0.1930** (0.098)	0.0242 (0.064)	-0.1512 (0.120)
观测值	600	600	597	597
AR(2)	1.87 [0.06]	-1.26 [0.21]	1.67 [0.10]	1.48 [0.14]
Sargan	29.21 [1.00]	28.22 [1.00]	25.98 [1.00]	26.58 [1.00]

注:圆括号是标准误,方括号是P值;***、**、*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使用Stata13估计整理得到

(2)替换企业家精神指标。首先,李小平和李小克(2017)^[27]指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仅利用企业数量衡量企业家创业精神会造成测量偏误,既可能低估企业家创业精神,又可能无法识别企业家创业成功与否,进而高估企业家创业精神。因此,借鉴李小平和李小克(2017)^[27]的做法,将企业家创业精神分为数量效应和就业效应,其计算公式如下:

$$be_{i,t} = \frac{qua_{i,t}}{pop_{i,t}} \times \frac{emp_{i,t}}{emp'_{i,t}} \quad (7)$$

其中, $qua_{i,t}$ 表示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数量, $pop_{i,t}$ 表示总人口, $emp_{i,t}$ 表示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就业人数, $emp'_{i,t}$ 表示总就业人数。利用包括数量效应和就业效应衡量的企业家创业精神指标的估计结果如表4第(1)列、第(3)列和第(5)列所示。估计结果显示,企业家创业精神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估计系数显著增大,说明在考虑企业家创业的数量效应和就业效应后,企业家创业精神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大。

表4 稳健性检验之二:替换企业家精神指标

变量	gini		gini_urb		gini_rural	
	(1)	(2)	(3)	(4)	(5)	(6)
be	-2.2864* (1.203)		-5.9805** (2.456)		-12.3875*** (3.359)	
lnper_accept		-0.0127*** (0.004)		-0.0081*** (0.003)		-0.0159*** (0.00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2480*** (0.031)	0.2387*** (0.028)	0.1566*** (0.017)	0.2487*** (0.061)	0.1889*** (0.026)	0.2129*** (0.034)
观测值	540	540	452	452	434	434
AR(2)	2.12 [0.03]	1.75 [0.08]	-0.01 [0.99]	-0.58 [0.56]	0.77 [0.44]	0.39 [0.69]
Sargan	25.33 [1.00]	22.94 [1.00]	25.48 [1.00]	24.59 [1.00]	18.12 [1.00]	19.47 [1.00]

注:圆括号是标准误,方括号是P值;***、**、*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使用Stata13估计整理得到

其次,利用15~64岁人口中每万人专利申请受理数替换15~64岁人口中每万人专利申请授权数,即采用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申请受理数之和除以15~64岁人口总数进行重新估计。专利申请受理数可以衡量全社会潜在企业家创新能力。潜在创新能力越高,全社会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就越高,从事创新活动的个体量也就越大,企业家创新活动就越活跃。估计结果如表4第(2)列、第(4)列和第(6)列所示,结果显示,企业家创新精神显著抑制了收入差距。

(3)工具变量法。利用滞后一阶作为工具变量并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进行估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企业家精神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但是,寻找工具变量并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进行估计会更优。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李宏彬等(2009)^[29]采用滞后30年的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占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作为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精神的工具变量。本文借鉴该思路,利用滞后30年的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占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作为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精神的工具变量,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表5给出了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DWH值完全显著,说明企业家精神存在内生性问题,一阶段F值均显著,且基本大于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一阶段估计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比重会制约了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精神。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显示,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精神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进一步说明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精神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表5 稳健性检验之三:工具变量

变量	gini		gini_urb		gini_rural	
	(1)	(2)	(3)	(4)	(5)	(6)
<i>entre</i>	-0.6129*** (0.124)		-0.3566 (0.282)		-0.6908*** (0.244)	
<i>lnper_granted</i>		-0.0612*** (0.013)		-0.0298 (0.024)		-0.0569** (0.02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1987*** (0.053)	0.0009 (0.094)	-0.0546 (0.116)	-0.1432 (0.188)	0.2455*** (0.067)	0.0531 (0.139)
观测值	513	513	427	427	409	409
R^2	0.7533	0.7004	0.5457	0.4948	0.5333	0.4094

第一阶段估计结果

国企职工比重	-0.2471*** (0.038)	-2.5658*** (0.508)	-0.1319*** (0.029)	-1.6187*** (0.485)	-0.1407*** (0.029)	-1.6169*** (0.49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0253 (0.069)	-3.184*** (0.921)	-0.0709*** (0.052)	-3.644*** (0.857)	-0.0261 (0.055)	-3.4044*** (0.921)
R^2	0.9039	0.8688	0.9410	0.8879	0.9426	0.8827
一阶段F值	40.74***	25.56***	20.05***	11.15***	22.14***	10.61***
DWH值	6.09** [0.0139]	10.13*** [0.0016]	10.53*** [0.0008]	11.0012*** [0.0003]	4.08** [0.0440]	5.08** [0.0247]

注:圆括号是标准误,方括号是P值;***、**、*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使用Stata13估计整理得到

3. 时期差异检验

在创业活动方面,2000年初中国实施了《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注册资本不再有最低限额;在创新活动方面,2000年开始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专利资助政策,全面资助三类专利的创新活动(龙

小宁和王俊,2015)^[31]。虽然创业和创新政策的实施多在2000年前后,但是,在中国开办企业的时间为38天、取得牌照的时间为336天^①,专利申请在经过初步审查符合要求的情况下自申请日起满18个月后公布,因此2000年实施的促进企业家精神的政策产生效果却在1年以后,即2001年底或2002年初。在21世纪初推行的两项促进创业和创新活动的政策之后,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精神呈现出结构性差异。同时,田卫民(2012)^[26]给出的三个层面的居民收入分配在2002年前后出现了变化,即在2002年之前三组基尼系数均呈现出快速的上涨趋势,而2002年之后上涨趋势受到扼制,收入差距趋于缓和。基于上述两个事实,将全样本划分为1995—2002年和2003—2015年两个子样本,以分别考察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精神对基尼系数影响的差异化。

表6列示了企业家精神对收入差距影响的时期差异检验结果。1995—2002年和2003—2015年期间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精神对总体基尼系数、城镇基尼系数和农村基尼系数的估计结果均存在显著差异。在1995—2002年时期内,企业家精神显著扩大了农村收入差距,而在2003—2015年时期内,企业家精神均显著缩小了收入差距。说明2000年左右实施的激发企业家创业和创新活动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降低创业门槛,提供创新资助,深化要素市场改革,营造宽松的创业和创新环境,使更多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但具有较高企业家才能的个体从事创业和创新活动,更充分的发挥企业家精神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重要作用。

表6 企业家精神对收入差距影响的时期差异

变量	gini			
	1995—2002		2003—2015	
	(1)	(2)	(3)	(4)
<i>entre</i>	0.0595 (0.171)		-0.0620* (0.038)	
<i>lnper_granted</i>		0.0329*** (0.005)		-0.0069*** (0.002)
观测值	189	189	351	351
<i>gini_urb</i>				
<i>entre</i>	-0.2176 (0.148)		-0.1201** (0.052)	
<i>lnper_granted</i>		0.0063 (0.004)		-0.0045* (0.002)
观测值	189	189	263	263
<i>gini_rural</i>				
<i>entre</i>	0.3064*** (0.071)		-0.4607*** (0.142)	
<i>lnper_granted</i>		0.0228*** (0.005)		-0.0162*** (0.005)
观测值	188	188	246	246

注:圆括号是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为节省篇幅,其他变量均已控制

资料来源:使用Stata13估计整理得到

①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2008)》。

4. 动态变化效应

为进一步考察企业家精神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动态变化,本部分采用面板分位数进行估计,以识别出收入差距在不同分位点位置企业家精神的动态影响。表7列示了相关估计结果。

表7 企业家精神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动态变化

变量	<i>gini</i>								
	Q10	Q20	Q30	Q40	Q50	Q60	Q70	Q80	Q90
<i>entre</i>	-0.1083 *** (0.036)	-0.0591 (0.041)	-0.1151 *** (0.038)	-0.1175 *** (0.035)	-0.1406 *** (0.031)	-0.1317 *** (0.028)	-0.1365 *** (0.033)	-0.0689 * (0.042)	-0.031 (0.053)
<i>lnper_granted</i>	-0.0218 *** (0.006)	-0.0212 *** (0.005)	-0.0228 *** (0.004)	-0.0204 *** (0.004)	-0.0182 *** (0.004)	-0.0147 *** (0.003)	-0.0165 *** (0.003)	-0.0149 *** (0.004)	-0.0052 (0.005)
观测值	567	567	567	567	567	567	567	567	567
<i>gini_urb</i>									
<i>entre</i>	-0.1195 (0.08)	-0.1287 * (0.072)	-0.0947 (0.059)	-0.0985 * (0.052)	-0.0915 * (0.048)	-0.0685 (0.048)	-0.0285 (0.042)	-0.0225 (0.037)	-0.0029 (0.035)
<i>lnper_granted</i>	-0.0042 (0.004)	-0.0062 * (0.004)	-0.0076 ** (0.004)	-0.0088 ** (0.004)	-0.0072 * (0.004)	-0.0039 (0.005)	-0.0017 (0.004)	-0.0023 (0.003)	0.0004 (0.003)
观测值	452	452	452	452	452	452	452	452	452
<i>gini_rural</i>									
<i>entre</i>	-0.1819 *** (0.035)	-0.1749 *** (0.033)	-0.1547 *** (0.029)	-0.1465 *** (0.028)	-0.1027 *** (0.029)	-0.0735 *** (0.026)	-0.0517 ** (0.026)	-0.0263 (0.031)	0.0029 (0.035)
<i>lnper_granted</i>	0.0137 *** (0.004)	-0.0139 *** (0.004)	-0.0131 *** (0.004)	-0.0119 *** (0.004)	-0.0077 * (0.004)	-0.0069 * (0.004)	-0.0057 (0.004)	-0.0047 (0.004)	0.0001 (0.004)
观测值	434	434	434	434	434	434	434	434	434

注:圆括号是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为节省篇幅,其他变量均已控制

资料来源:使用Stata13估计整理得到

从总体基尼系数估计结果来看,随着总体基尼系数的提高,企业家创业精神指标对总体基尼系数的影响程度逐渐增加,即企业家创业精神对总体基尼系数50分位数以下的影响程度小于50分位数以上的影响程度。另一方面,随着总体基尼系数的提高,企业家创新精神指标对总体基尼系数的影响程度逐渐降低,即企业家创新精神对总体基尼系数50分位数以下的影响程度大于50分位数以上的影响程度。从城镇基尼系数估计结果来看,随着城镇基尼系数的提高,企业家创业精神指标对城镇基尼系数的影响程度逐渐下降,即企业家创业精神对城镇基尼系数50分位数以下的影响程度大于50分位数以上的影响程度。同样地,随着城镇基尼系数的提高,企业家创新精神指标对城镇基尼系数的影响程度逐渐下降,即企业家创新精神对城镇基尼系数50分位数以下的影响程度大于50分位数以上的影响程度。从农村基尼系数估计结果来看,随着农村基尼系数的提高,企业家创业精神指标对农村基尼系数的影响程度逐渐下降,即企业家创业精神对农村基尼系数50分位数以下的影响程度大于50分位数以上的影响程度。同样地,随着农村基尼系数的提高,企业家创新精神对农村基尼系数的影响程度逐渐下降,即企业家创新精神对农村基尼系数50分位数以下的影响程度大于50分位数以上的影响程度。

因此,综合表7面板分位数估计结果可知,在低分位点,企业家精神均能显著地缩小收入差距,而在高分位点,企业家精神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明显降低,尤其是在90分位点上,企业家精神无法有效缩小收入差距。在收入差距越低的区域,企业家精神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越大;在收入差距越

高的区域,企业家精神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越小。

5. 机制检验

假说 H₂ 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家精神通过就业效应、流动性效应、经济增长效应和减贫效应四种机制来缩小收入差距。为检验这四种效应是否存在,借鉴 Baron 和 Kenny (1986)^[35]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中介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gini_{i,t} = \beta_0 + \beta_1 gini_{i,t-1} + \beta_2 entre_{i,t} + \sum_{\kappa} \beta_{\kappa} control_{i,t} + \xi_{i,t} \quad (8)$$

$$M_{i,t} = \gamma_0 + \gamma_1 M_{i,t-1} + \gamma_2 entre_{i,t} + \sum_{\kappa} \gamma_{\kappa} control_{i,t} + \xi_{i,t} \quad (9)$$

$$gini_{i,t} = \varphi_0 + \varphi_1 gini_{i,t-1} + \varphi_2 entre_{i,t} + \varphi_3 M_{i,t} + \sum_{\kappa} \varphi_{\kappa} control_{i,t} + \xi_{i,t} \quad (10)$$

在式(8)中, β_2 表示总效应, φ_2 表示直接效应,而 $\gamma_2 \times \varphi_3$ 表示中介效应,即表示企业家精神通过影响中介变量而影响收入差距的作用。 $M_{i,t}$ 表示中介变量,依次包括就业效应、流动性效应、收入效应和减贫效应。在实证检验中,无法直接检验流动性效应,原因在于无法获取省级层面流动性的数据。但是收入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流动性效应,收入的流动性表明低收入者转变为中高收入者,中高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体现出了收入增加效应。表8列示了基于式(8)、式(9)和式(10)的估计结果。

首先,表8第一部分列示了就业效应。考察企业家精神的就业效应,选择就业指标更优,即利用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吸收的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能更好的体现出企业家精神对劳动力就业的吸纳能力。然而,在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衡量时已经采用了该指标,所以,准确估计企业家精神通过就业效应而缩小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本文借鉴王先柱等(2015)^[14]的方法,采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给出的失业率进行替代。表8第一部分第(1)列和第(2)列,显示了企业家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对失业率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企业家精神显著降低了失业率。然后,将失业率指标纳入式(10)中进行估计,表8第一部分第(3)列至第(8)列显示了企业家精神与失业率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企业家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指标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且失业率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家精神具有通过降低失业率、提高就业率而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其次,表8第二部分显示了收入效应。关于收入效应衡量,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其他经济单位的平均货币工资。表8第二部分第(1)列和第(2)列显示了企业家精神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企业家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即企业家精神可以显著促进工资水平的提高,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表8第(3)列至第(8)列显示了企业家精神与工资收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企业家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指标估计系数为负,工资收入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由此可知,企业家精神具有通过提高工资水平、促进收入增加而降低收入差距的作用。

最后,表8第三部分显示了减贫效应。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给出的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数据。表8第三部分第(1)列和第(2)列显示了企业家精神对农村贫困率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企业家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即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精神具有减少农村贫困人口、降低农村贫困率的作用。表8第三部分第(3)列至第(8)列显示了企业家精神与贫困率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企业家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指标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贫困率估计系数为正。由此可知,企业家精神具有通过减少农村贫困人口、降低贫困率而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因此,综合表8的估计结果可知,企业家精神可以通过就业效应、收入效应和减贫效应而缩小收入差距。

表 8 企业家精神与收入差距:机制检验

就业效应								
变量	<i>unemploy</i>		<i>gini</i>		<i>gini_urb</i>		<i>gini_rural</i>	
	(1)	(2)	(3)	(4)	(5)	(6)	(7)	(8)
<i>entre</i>	-0.0126*** (0.002)		-0.0479*** (0.012)		-0.1000** (0.040)		-0.0847*** (0.029)	
<i>lnper_granted</i>		-0.0017*** (0.000)		-0.0050*** (0.002)		-0.0092*** (0.002)		-0.0092*** (0.003)
<i>unemploy</i>			0.1753* (0.106)	0.1458 (0.271)	0.7026*** (0.233)	0.8828** (0.400)	0.4548* (0.262)	0.3889 (0.394)
<i>Sobel</i> [<i>P-value</i>]			-2.252 [0.024]	-4.133 [0.0000]	-5.067 [0.000]	-3.637 [0.0002]	-4.9951 [0.000]	-1.946 [0.052]
观测值	594	594	537	537	449	449	431	431
收入效应								
变量	<i>lnwage</i>		<i>gini</i>		<i>gini_urb</i>		<i>gini_rural</i>	
	(1)	(2)	(3)	(4)	(5)	(6)	(7)	(8)
<i>entre</i>	0.1148# (0.077)		-0.0180 (0.031)		-0.1185*** (0.021)		-0.0126 (0.022)	
<i>lnper_granted</i>		0.0208** (0.009)		-0.0031* (0.002)		-0.0052** (0.002)		-0.0024 (0.003)
<i>lnwage</i>			-0.0104*** (0.004)	-0.0258*** (0.004)	-0.0110*** (0.003)	-0.0139*** (0.004)	-0.0183*** (0.003)	-0.0164*** (0.006)
<i>Sobel</i> [<i>P-value</i>]			6.223 [0.000]	8.174 [0.000]	5.437 [0.000]	4.553 [0.000]	-3.517 [0.0002]	2.792 [0.008]
观测值	597	597	539	539	451	451	433	433
减贫效应								
变量	<i>poverty</i>		<i>gini</i>		<i>gini_urb</i>		<i>gini_rural</i>	
	(1)	(2)	(3)	(4)	(5)	(6)	(7)	(8)
<i>entre</i>	-0.0510*** (0.016)		-0.0276*** (0.004)		-0.0625 (0.081)		-0.0244*** (0.006)	
<i>lnper_granted</i>		-0.0091*** (0.003)		-0.0012** (0.001)		-0.0123** (0.006)		-0.0083 (0.006)
<i>poverty</i>			0.0323*** (0.013)	0.0141 (0.010)	0.0938*** (0.016)	0.0052 (0.057)	0.0407 (0.034)	0.0862*** (0.019)
<i>Sobel</i> [<i>P-value</i>]			-7.093 [0.000]	-6.861 [0.000]	-2.926 [0.003]	-2.681 [0.007]	-3.675 [0.0002]	-2.571 [0.01]
观测值	145	145	157	157	78	78	72	72

注:圆括号是标准误,方括号是 *P* 值;***、**、*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表示的 *P* 值为 0.13;为节省篇幅,其他变量均已控制

资料来源:使用 Stata13 估计整理得到

五、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与收入差距

为了检验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对收入差距是否存在扩大作用。本部分着重考察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估计模型如下所示：

$$gini_{i,t} = \beta_0 + \beta_1 gini_{i,t-1} + \beta_2 entre_quality + \sum \beta_k control_{i,t} + \xi_{i,t} \quad (11)$$

表 9 列示了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对收入差距影响的估计结果。表 9 第(1)列至第(3)列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进行估计,第(4)列至第(6)列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进行估计。无论是系统广义矩估计结果还是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均表明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对总体基尼系数和农村基尼系数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对城镇基尼系数的估计结果显著为负。正如前文指出,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有别于非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一方面要求具备更高的企业家才能,以及在创业和创新活动中具备更好的外部条件,包括企业家个人财富水平、经营管理经验、社会网络等(Ozgen 和 Baron,2007)^[36],从而降低了高质量型企业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进而提高了总体基尼系数;另一方面,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具备更强的“破坏性”和更持久的垄断性,强大的创新能力既提高了个体成为高质量型企业家的门槛,又提高了高质量型企业家的风险。同时,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会增加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降低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雷欣等,2014)^[34]。因此,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通过设定更高的门槛,降低了个人成为高质量型企业家的概率,阻碍了更多个体成为企业家,降低流动性,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表 9 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变量	SYS-GMM			2SLS		
	<i>gini</i>	<i>gini_urb</i>	<i>gini_rural</i>	<i>gini</i>	<i>gini_urb</i>	<i>gini_rural</i>
	(1)	(2)	(3)	(4)	(5)	(6)
<i>entre_quality</i>	0.0499*** (0.005)	-0.0108* (0.006)	0.0317*** (0.010)	0.2200*** (0.055)	-0.0846* (0.051)	0.0967* (0.05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3509*** (0.030)	0.3720*** (0.025)	0.3041*** (0.029)	0.3063*** (0.064)	0.0849* (0.051)	0.4757*** (0.056)
观测值	540	452	434	513	427	409
R^2				0.663	0.479	0.566
$AR(2)$	1.25 [0.21]	-0.55 [0.58]	0.49 [0.62]			
<i>Sargan</i>	25.27 [1.00]	26.31 [1.00]	25.28 [1.00]			
一阶段 F 值				27.51***	17.75***	17.85***
DWH 值				18.53***	15.48***	14.83***

注:圆括号是标准误,方括号是 P 值;***、**、*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为节省篇幅,其他变量均已控制

资料来源:使用 Stata13 估计整理得到

由表 9 的估计结果可知,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抑制总体基尼系数主要源自于农村基尼系数,即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主要源自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对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就是说,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只能显著扩大农村基尼系数,却不能扩大城镇基尼系数,反而具有抑制城镇基尼系数的作用。其原因可能在于:第一,城镇与农村的经济系统治理模式差异。城

镇地区受现代化的深刻影响,经济活动跨越宗族关系、血缘关系,城镇组织外部执行力发挥着重要作用,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更能体现企业家的才能(Greif和Tabellini,2010)^[37]。而农村地区尚处于相对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组织状态,其治理模式以血缘关系的宗族网络为主,使得农村地区创业行为存在显著地宗族关系、家庭裙带关系等,导致农村地区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无法实现,创业活动不能充分体现企业家才能(郭云南和姚洋,2013)^[38]。第二,城镇与农村的规模经济效应差异。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下,大量人口流入城市,形成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在规模经济效应下,分工演化速度快,为更多的劳动者提供就业岗位,在分工裂变的过程中为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提供了生存空间,更多的劳动者具有创新和创业的可能性。而农村地区人口规模逐渐降低,分工裂变速度慢,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成为无用武之地,阻碍更多的劳动者进行创业和创新行为。双重因素导致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显著扩大农村地区收入差距而抑制城镇地区收入差距。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考察企业家精神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首先,从理论上说明企业家与收入差距之间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其次,利用1995—2015省级面板数据,进一步考察企业家精神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基准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显著缩小了收入差距。通过替换基尼系数、企业家精神指标和利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该结果依然稳健;第二,时段差异结果表明,1995—2002年期间,企业家精神显著扩大农村收入差距,而2003—2015年,企业家精神均显著缩小收入差距;第三,分位数估计结果表明,在收入差距越低的区域,企业家精神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越大;在收入差距越高的区域,企业家精神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越小;第四,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具有促进就业、提高收入和减少贫困的作用,进而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第五,利用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数据,结果发现,高质量型企业家精神具有扩大总体收入差距和农村收入差距的作用,但显著抑制城镇收入差距。

由此可见,企业家精神并不是造成收入差距持续恶化的原因,相反,利用并发挥企业家的直接增收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可以实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的。因此,企业家精神与收入差距之间并不是对立的矛盾体,而是高度统一的矛盾体。基于本文的研究,为遏制持续恶化的收入差距,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营造环境,促进企业家精神培育,继续推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降低企业家创业和创新活动门槛,健全企业家市场激活机制,促进更多具有冒险精神的个体从事创业和创新活动;第二,着力推进“万企帮万村”政策,企业家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到扶贫攻坚的事业中,为减贫脱贫做出积极贡献;第三,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村劳动力市民化,通过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和创业环境,让城市成为转移农村劳动力的港湾。

参考文献

- [1]刘伟,王灿,赵晓军,张辉.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原因和对策研究[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5):25-43.
- [2]张顺,薛建强.收入差距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J].新乡:管理学报,2014,(6):35-39.
- [3]李楠.中国所有制结构演变对收入分配的影响[J].北京: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9):26-30.
- [4]唐未兵,傅元海.所有制结构变迁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阈值效应[J].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2):47-61.
- [5]钱颖一.国企不缺企业家精神[J].北京:资本市场,2016,(Z3):16.
- [6]Lippmann, S., A. Davis, and H. Aldrich. Entrepreneurship and Inequality[J].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2005, (15):3-31.
- [7]Atems, B., and G. Shand.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and Income Inequality[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8, 54, (4):905-922.
- [8]Halvarsson, D., K. Martin, and W. Karl. Entrepreneurship and Income Inequality[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18, (145): 275 – 293.

[9] Ragoubi, H., and S. Harbi. Entrepreneurship and Income Inequality: A Spatial Panel Data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2018, 32, (3): 374 – 422.

[10] Bonito, J., F. Daantos, J. Mateo, and M. Rosete. Do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Affect Poverty,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Review of Integrative Business & Economics Research, 2017, 6, (1): 33 – 43.

[11] Kimhi, A. Entrepreneurship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Southern Ethiopia[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0, (34): 81 – 91.

[12] Berkowitz, D., and J. Jackson.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Evoluti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s in Poland and Russi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6, (34): 338 – 356.

[13] DaCosta, M., and L. Yan. Entrepreneurship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J]. Journal of Business Diversity, 2017, 17, (2): 41 – 62.

[14] 王先柱, 陈峰, 杨义武. 企业家精神与收入不平等——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哈尔滨: 学习与探索, 2015, (11): 111 – 116.

[15] 李政, 杨思莹. 创业能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 北京: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7, (3): 21 – 32.

[16] Spubler, 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Microeconomics with Endogenous Entrepreneurs, Firms, Markets, and Organiz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7] Lewis,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J].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2, (2): 139 – 191.

[18] Gilbert, B., D. Audretsch, and P. McDougall. The Emerg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Policy[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4, 22, (3 – 4): 313 – 323.

[19] Fritsch, M., and P. Mueller. The Effect of New Business Formation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Over Time: The Case of Germany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8, 30, (1): 15 – 29.

[20] Quandrini. The Importance of Entrepreneurship for Wealth Concentration and Mobility[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1999, 45, (1): 1 – 19.

[21] Bruton, G., D. Ketchen, and R. Ireland. Entrepreneurship as a Solution to Poverty[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3, 28, (6): 683 – 689.

[22] Sarkar, S. Grassroots Entrepreneurs and Social Chang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the Role of Bricolage[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8, 30, (3 – 4): 421 – 449.

[23] Hussain, M., A. Bhuiyan, and R. Bakar.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an Empirical Review [J]. Journal of Asian Scientific Research, 2014, 4, (10): 558 – 573.

[24] Kareem, R.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on Poverty Alleviation [J]. Journa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Education, 2015, 7, (1): 1 – 16.

[25] 韦吉飞. 农民创业对农村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影响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2): 16 – 22.

[26] 田卫民. 省域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测算及其变动趋势分析[J]. 北京: 经济科学, 2012, (2): 48 – 59.

[27] 李小平, 李小克. 企业家精神与地区出口比较优势[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7, (9): 66 – 81.

[28] Hebert, R., and A. Link. In search of the Meaning of Entrepreneurship[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1989, 1, (1): 39 – 49.

[29] 李宏彬, 李杏, 姚先国, 张海峰, 张俊森. 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 北京: 经济研究, 2009, (10): 99 – 108.

[30] 陈俊杰. 制度变迁、企业家精神与民营经济发展[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6, (8): 39 – 54.

[31] 龙小宁, 王俊. 中国专利激增的动因及其质量效应[J]. 北京: 世界经济, 2015, (6): 115 – 142.

[32] Blundell, R., and S. Bond. 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 [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8, 87, (1): 115 – 143.

[33] 陈斌开, 林毅夫. 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4): 81 – 102, 206.

[34] 雷欣, 陈继勇, 覃思. 开放、创新与收入不平等——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4, (5): 1 – 12.

[35] Baron, M., and D. Kenny.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 (6): 1173 – 1182.

[36] Ozgen, E., and R. Baron. Social Sources of Information in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Effects of Mentors, Industry Networks, and Professional Forum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7, 22, (2): 174 – 192.

[37] Greif, A., and G. Tabellini.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Bifurcation: China and Europe compared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 (2): 135 – 140.

[38] 郭云南, 姚洋. 宗族网络与农村劳动力流动[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3, (3): 69 – 81.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Income Gap: Analysis of Effects and Mechanisms

CHENG Rui

(School of Economic &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nxi, 710127,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alls for entrepreneurship to explore new impetus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on the other hand,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is needed to achieve longing for better life. Whether entrepreneurship and income gap are irreconcilable contradictions are issues that must be answered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Previous literature mainly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in developed countries on the income gap and holds that entrepreneurship plays a role in widening the income gap.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China. In China, th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on the income gap needs further investigation to enrich relevant literature. Therefo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and income gap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y and evidence.

Firstly, this article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this, it theoretically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and income disparity. And then, it proposed three hypotheses. Secondly, this paper uses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5 to 2015 for empirical testing.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provincial Gini coefficient measured by Tian Weimin (2012) as an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income gap, and draws on Hébert and Link (1989) to divide entrepreneurship into entrepreneur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entrepreneurial innovation, and then refer to Li Hongbin et al. (2009) to measure entrepreneurship. The system generalized moment method (SYS-GMM) proposed by Blundell and Bond (1998) is used for estim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efficient of entrepreneurship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that is, entrepreneurship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he income gap. And this result is robust by replacing the Gini coefficient, entrepreneurship and using the ratio of state enterprise workers 30 years as instrumental variable. Using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proposed by Baron and Kenny (1986) to study the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three mediating effects, which are the employment effect, income effect and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Quantil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at the low point, entrepreneurship could significantly narrow the income gap, while at the high point, entrepreneurship could not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ncome gap. This paper also tries to distinguish high-quality entrepreneurship and research the impact of high-quality entrepreneurship on income gap, which show that the high quality-entrepreneurship significantly expands the overall Gini coefficient and the rural Gini coefficient, while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he urb Gini coefficient.

In the new era, to achieve the win-win goal of both economic growth and better life,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we should firmly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o stimulate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of the whole society. The policy of “ten thousand enterprises help ten thousand villages” should be actively promoted to give play to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entrepreneurs. In order to weake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high-quality entrepreneurship, urbanization must be accelerated which transfer surplus the rural labor and help them to find better jobs by providing basic public services.

Key Words: entrepreneurship; income gap; high-quality entrepreneurship

JEL Classification: D31, L26, O15

DOI:10.19616/j.cnki.bmj.2019.06.006

(责任编辑:张任之)